

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模式的构建论析

孙丽娜^{1,2}, 郭付豪¹, 孔瑞¹

(1.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401;

2. 河北工业大学 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研究中心, 天津 300401)

[摘要] 京津冀地区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地位重要、红色资源丰富。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协同基础深厚,历史上各革命阶段相互关联,地理上区位优势互补,文化上均承载党的初心使命与革命精神。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模式构建,需建立跨区域体制机制,遵循党的领导、协同创新、立足民生原则。目前,模式构建面临行政壁垒与利益博弈、资源整合低效与同质化、创新传播弱化等困境,破解困境需以顶层设计破除行政壁垒、以系统思维整合红色资源、以创新理念激活旅游产业、以人才战略夯实发展根基。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6.02.011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6)02-0092-08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军区军史馆视察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作为百年党史波澜历程的重要见证与提炼凝结,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底蕴。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文化珍馐,值得从学术层面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红色文化”^①这一命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围绕京津冀红色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尚存拓展空间:一是整体性研究不足,现有成果多聚焦单一城市或领域,缺乏京津冀协同战略下的整体视角,未系统梳理三地红色文化与内外文化的关联;二是理论架构不完善,对其革命到建设、改革的演进逻辑及新时代内涵探究不深,未形成系统理论体系;三是对策碎片化,现有宏观建议相对缺乏破解行政壁垒、数字化传播等具体方案,且未经实践验证^[2]。因此,笔者试图在充分汲取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分析,探讨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理想化模式,并针对模式构建的当前困境提出一定的可行方案,以期能为推动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略添助益。

一、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3]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文脉相连,在红色文化资源方面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基础,为构建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关于京津冀红色文化共同体模式的构建问题的探讨,必须立足于京津冀地区的具备实践经验的、可实际调研观测的红色文化资源,厘清京津冀三者 in 共同体模式构建中的协同基础,进而为共同体模式的构建提供清晰的逻辑支点。

首先,从历史脉络看,京津冀地区在革命进程中相互关联、协同共进。建党前后,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新文化从这里传播开来,如星星之火般点燃天津、河北乃至全

^①本文中京津冀红色文化主要是基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指涉的“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推及而来,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京津冀历程的遗址、遗迹和纪念建筑,以及由此演化的革命文化。

[投稿日期] 2025-09-22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TJKS20-003);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230201008)

[作者简介] 孙丽娜(1970—),女,河北昌黎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京津冀文化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爱国热情。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河北农村广泛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村党组织,为革命发展积蓄力量,同时也为京津地区的革命活动提供人员、物资等方面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京津冀地区更是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战场,平西、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相互配合,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同谱写辉煌壮丽的抗战史诗。解放战争时期,河北解放区作为战略后方,以百万民工支前、千条运输线保障,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筑牢根基;天津攻坚战中,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城防图与北平外围的军事牵制形成呼应,而北平的和平解放更是三地军民共同推动的结果——河北军区部队封锁外围交通,天津解放的威慑与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交织,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4]。不同革命阶段紧密联系,使得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在历史维度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其次,在地理区位上,京津冀地区同属华北平原,山水相依,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十分易于历史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稳定分布”^[5]。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天津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交通枢纽,是连接北京与河北乃至东北地区的关键节点,红色文化资源在区域传播中起到桥梁作用;河北环绕北京和天津,拥有丰富的革命老区资源,京津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使得三地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具备天然优势。这种地缘优势为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的协同开发、共享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即京津冀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毗邻、在历史脉络上彼此衔接,不仅各自彰显着独特的革命故事,更是共同勾勒出中国革命从萌芽、发展到胜利的完整轨迹。天然的空间聚合性不仅让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区域联动开发具备了现实可能,还能通过整合线路、共享展品、联合宣讲等方式,让三地的红色故事相互印证、彼此赋能,形成“1+1+2”的叠加效应,使红色文化在协同中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

最后,从文化内涵看,京津冀红色文化资源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共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革命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北京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如北大红楼所体现的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励着天津和河北的革命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天津红色文化中展现的坚韧不拔、灵活应变的革命智慧,同样影响着北京和河北的革命实践;河北红色文化所彰显的军民鱼水情、艰苦奋斗精神,也是北京和天津红色文化

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与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率先以思想启蒙打破封建桎梏,孕育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内核,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最初的思想萌芽;天津觉悟社以“革新、奋斗”为精神旗帜,在京津地域联动中迅速响应北京的新思潮,成为连接思想启蒙与实践抗争的重要纽带;河北大地上,西柏坡的“两个务必”是革命即将胜利时对自我警醒的深刻总结,再庄地道战的“军民团结”展现出人民群众与革命力量生死与共的实践智慧。从思想启蒙到行动呼应,再到实践深化,三地红色文化精神如同一条绵延的河流,在历史进程中相互滋养、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连贯而厚重的重要篇章。京津冀红色文化在价值理念上的高度契合,为三地协同构建红色文化创新共同体奠定了精神基石,使得资源整合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串联,更是精神内核的共鸣,从而凝聚起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模式探讨

“模式”是一个跨学科的核心概念,其含义随语境而变化,但本质是从混沌中提取秩序,如自然科学中的晶体排列、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周期,皆属其范畴。文化共同体以共同文化认同为核心,既能凝聚成员协作力量,也能强化群体价值共识。而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则是立足于京津冀区域红色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质的禀赋,以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以协同性与创新性为核心路径,以满足民生需求为价值导向,通过构建跨区域动力激发、资源整合、监督协调的体制机制,制定清晰可落地的运行规则,实现红色文化系统性保护、创新性转化与整体性影响力提升的区域文化发展共同体。其模式构建的关键在于双重支撑:一是建立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跨区域协作体制机制;二是坚守方向正确、实操可行的方法原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保障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是凝聚区域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一) 协同创新共同体的体制机制

首先,在动力机制层面,需将红色文化协同发展纳入区域治理的制度框架,通过政策引导确立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政策设计应将红色文化保护传承转化为三地政府的共同责任,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绩效考核体系,使协同行为成为各主体自觉的实践活动。市场层面的利益联结需在红色文

旅产业链中明确不同环节的劳动贡献,形成与其投入相匹配的分配机制,既承认创意设计的复杂劳动价值,也肯定生产销售环节的具体劳动价值,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激发各环节的积极性。社会参与机制则应构建覆盖不同群体的参与渠道,使红色文化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精神载体,通过志愿服务、文物捐赠、创意创作等形式,让群众从协同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努力实现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其次,资源的高效流动与整合,需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地域壁垒,使红色文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资源的标准化建设,使三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够按照社会需求进行合理流动;数字共享平台的建设,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使分散的红色文献、影像资料等成为可共享的精神财富,既满足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需求,又为文化企业的创新实践提供素材,实现资源的多重价值;文物保护的跨区域协作,则通过三地技术力量、设备资源的协同,形成对红色文物的全方位保护,使珍贵的革命遗产得到更科学的修复与传承;人才与技术的流动,通过跨区域交流与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使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获得持续的人才支撑,同时推动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让先进技术成为提升红色文化传播力的重要手段。

最后,监督评估与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是解决协同发展中各种矛盾的重要保障,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争议解决机制,有助于确保协同过程的健康有序。评估体系的设计将资源整合的实际成效、群众的真实反馈、文化传播的社会影响等作为衡量协同工作的根本依据,避免形式主义的评价标准。社会监督机制赋予群众对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监督权,通过举报、评议等方式,及时纠正协同过程中的偏差,确保红色文化的公益性与严肃性。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通过识别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利益风险等潜在矛盾,提前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利益争议的调解与仲裁,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纠纷。结合历史背景、劳动贡献、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合理裁决,既维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协同发展的整体利益,最终实现红色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成为凝聚区域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二) 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方法原则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原则,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

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实践,彰显红色文化本质属性与政治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6],为红色文化协同创新提供根本遵循。在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实践中,党的领导既体现为组织层面的统筹协调,也展现为思想层面的价值引领。这体现在通过梳理三地红色历史脉络,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区域革命实践深度融合,构建逻辑连贯、内涵统一的历史叙事体系;同时坚守红色文化意识形态属性,建立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性叙事体系,抢占软性化叙事相关阵地可一定程度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7]

其次,突出“协同性”与“创新性”是破除区域文化壁垒、激活红色资源生命力的关键路径,二者辩证统一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践中。协同性的核心在于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保留三地红色文化个性的基础上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京津冀三地红色资源各具特质: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承载着建党、建国等重大历史节点的核心记忆;天津作为近代工业城市,留存着工人运动与地下斗争的独特印记;河北作为敌后抗战主战场,孕育了地道战、雁翎队等军民协同的革命智慧。协同创新并非抹杀三地个性,而是通过跨区域主题建立有机联系。创新性则要求突破传统传承模式的局限,运用当代科技与传播理念赋予红色文化新的表达形式。VR/AR技术的应用使云端红色展馆成为可能,既保持了历史的严肃性,又增强了文化的吸引力,能够使红色文化在代际传递中焕发新的生机。

最后,立足于民生需求体现了红色文化“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本质属性。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不能脱离群众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需求,而应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滋养心灵、凝聚共识的精神沃土。瑞金“红色文化进社区、进校园”的联合活动形式^[8]值得借鉴,该活动有助于打破红色教育的场所限制,使京津冀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在社区,社区工作者通过“红色故事会”邀请老党员讲述亲身经历,让红色文化从展馆走向街头巷尾;在校园,三地教育部门联合开发研学课程,将北京的北大红楼、天津的周邓纪念馆、河北的冉庄地道战遗址转化为“行走的课堂”,使青少年在实地探访中理解历史,在互动体验中感悟精神。红色文化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历史符号,而是成为与群众情感相连、与生活相融的精神资源,在满足民生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

三、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模式构建的困境挑战

“面积 21.6 万平方千米、拥有 1 亿多人口的京津冀地区,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天然基础。”^[9] 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虽具备政策支持与资源基础,但在实践推进中仍面临多重困境。这些困境本质上是区域协同发展中体制机制障碍、利益分配矛盾与文化创新乏力的集中体现,需从深层肌理中剖析症结所在。

(一) 行政壁垒与利益协调的调适难题

行政壁垒与利益协调的博弈构成首要困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框架中,文化协同本应凭借三地同属一个文化圈的天然优势,成为打破区域分割、凝聚发展共识的重要纽带。然而,行政壁垒的刚性约束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却让文化协同发展陷入了首要困境,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联系比人口联系、文化联系更为密切。^[10] 长久以来,河北“依托京津发展”的定位^[11],使河北呈现出显著“依附性”却未收获对等收益。作为革命老区,河北拥有西柏坡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却为配合京津发展,在红色文化保护中让渡资源,且红色旅游配套投入常让位于经济项目。而“环京津贫困带”致其红色文化保护陷入“三缺”困境:北京吸引河北红色文化领域人才、资金与企业,造成河北“空心化”,却未推动跨区域红色文化产业调整,使河北红色文化停留在“单点开发”阶段。核心矛盾在于三地政府以本地利益为导向的“差异化定位”,形成“各自为政”惯性。北京侧重“国家红色文化中枢”,服务首都功能,协同考量少;天津聚焦“近代革命与工业遗产”融合;河北虽打造《关于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12],但受限资源,其规划难与京津互补。这种定位割裂了京津冀红色文化整体脉络,未能形成完整华北红色文化谱系。综上所述,行政壁垒下的治理分割与利益博弈,是京津冀文化协同的“拦路虎”。若不打破惯性、解决政策衔接问题,平衡利益、文化协同难成区域协同“纽带”,还可能加剧发展不平衡,这是当前需破解的关键困境。

(二) 资源整合与同质化开发的矛盾难题

除行政壁垒与利益博弈外,资源整合低效与同质化开发盲目,是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的另一关键困境。三地红色文化资源总量可观、类型多样,但受

分布不均、开发失衡的影响,未释放整体价值,也制约文化协同深度推进。三地红色文化资源“量”“质”失衡,呈现以北京为核心、河北为薄弱环节的“两极分化”。北京凭借政治与经济优势,集聚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载体,数字化技术先进、资金充足,相关场馆是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传播核心;河北虽为红色资源“富矿”,但部分纪念馆仅能维持基本开放,展陈方式传统、文物修复经费紧缺、专业人才少,甚至部分县级馆缩减服务,形成“实质断层”,导致河北资源价值被低估,三地协同缺乏均衡基础,出现马太效应。三地虽推出“京津冀红色旅游一卡通”、跨区域线路等整合举措,但多停留在“形式串联”,面临“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13] 以“抗战记忆线”为例,串联的北京平西抗日根据地、天津盘山烈士陵园、河北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展览内容独立,未系统诠释“华北抗战整体性”,导致游客难以形成连贯的历史认知^[14],整合仅为资源“物理叠加”,未达价值共鸣。“建党初心线”的同质化问题则表现为线路串联的北京北大红楼、河北李大钊故居等核心点位,存在显著的内容重复与特色缺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核心载体的北大红楼,其“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主题展重点呈现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而河北李大钊故居的展览同样以其生平事迹与革命活动为主线,未结合地域场景挖掘特色叙事,例如李大钊在故乡传播新思想、培养本地革命力量的实践细节均未充分展开。两地均聚焦人物共性经历,未形成“北京侧重思想传播中枢、河北凸显乡土革命根基”的差异化定位。本质上,该矛盾源于区域协同理念缺失与发展短视。三地未建立“全域统筹”资源调配机制,也无“差异化互补”共识,陷入资源消耗与特色消解。若不扭转,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难达预期效果,还可能削弱红色文化凝聚力,成为区域文化协同的“第二道鸿沟”。

(三) 创新能力与传播效能的弱化难题

除行政壁垒与资源整合矛盾外,创新能力匮乏与传播效能弱化,是制约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发展的关键瓶颈。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京津与河北之间存在着协同创新不平衡的问题。^[15] 面对新媒体时代受众需求变化,三地在传播载体、内容创作、渠道协同上均滞后,难以触达青少年等群体,也未将红色文化精神价值转化为广泛社会共识,偏离文化协同传播目标。三地红色文化传播依赖传统模式,数字化技术应用区域失衡。多数场馆以“文物+文

字”静态展陈为主,仅北京、天津少数核心场馆(如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运用VR、AR、数字投影等技术^[16],且未形成区域辐射。河北因资金、人才短缺,多数红色纪念馆仍为“图片+实物”传统展陈,部分县级场馆连官网维护都困难,技术“两极分化”导致三地传播“断层”,游客跨区域游览易有割裂感。同时,红色文化内容创作存在“同质化、浅表化”问题,多停留在复述英雄生平、梳理事件脉络,未深挖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也忽视三地红色文化精神共性与关联,未阐释其“初心使命”等共同内核;内容重复聚焦经典人物事件,对“平北抗日根据地群众支援故事”等本土小众红色资源挖掘不足,难以引发当代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共鸣。此外,三地传播渠道分散、缺乏协同,难以形成合力。媒体以本地利益为导向:北京媒体侧重国家红色叙事,天津聚焦本地特色,河北宣传老区资源却因平台影响力弱、内容包装差难破区域限制,且三地无协同传播机制,无跨区域传播联盟与联合项目,导致红色文化难成统一区域品牌,受众仅获碎片化信息,未能成为凝聚区域共识的精神纽带。本质上,该问题源于缺乏协同思维与用户导向,三地未打破资源区域壁垒,也未关注受众需求,若不推动传播数字化、内容深度化、渠道协同化,红色文化协同发展将难破传播瓶颈,精神与时代价值也难以彰显。

四、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模式的构建进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17]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破解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的困境,需从体制机制重构、资源整合升级、创新动能培育等维度构建系统性进路,通过“破壁垒、强整合、促创新”实现红色文化整体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在勾连历史的同时,面向现代与未来,在文化发展中延续文脉,对其进行当代阐释与实践,更好地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共同体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

(一) 以顶层设计破解行政壁垒,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布局中,北京是“一核”,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的协同发展。^[18]据2020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数据,三地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存在显著落差:2019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

资产总计达19020.3亿元,同期天津市为2497.6亿元,河北省则为2279.3亿元。从产业贡献度来看,2018年北京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075.1亿元,占当地GDP比重达9.29%,该占比位居全国首位;天津同期增加值为573.8亿元,GDP占比4.29%;河北省增加值845.6亿元,GDP占比仅2.6%。^[19]不难发现,北京作为我国首都与全国文化中心,其“虹吸效应”尤为突出,不仅集聚了大量文化领域投资者与龙头企业,更成为文化资源高效转化的核心高地,进一步拉大了与津冀两地的发展差距。受限于顶层设计的缺位,三地文化产业合作多以各自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尚未构建起高效协同的文化资源联动机制,这一现状亟待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破局。破解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需以顶层设计为核心抓手,构建全域统筹、权责明晰、利益协调的协同治理体系。立足北京“一核”引领和两翼协同的区域发展布局,针对三地文化发展不平衡、雄安新区文化建设短板突出、文化产业集群尚未形成等问题,首要任务是建立超越行政区划的“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即由三地省级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整合文旅、财政、文物等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统筹制定五年协同发展规划^[20],审批跨区域红色文化项目,并主导利益分配协调,从制度层面打破“各自为政”的治理惯性。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统一的京津冀文化大市场,促进红色文化资源、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三地红色文化协同发展筑牢制度根基,释放“1+1+2>4”的整体效能,“加快形成统一的京津冀文化大市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21]。

(二) 以系统思维整合红色资源,打造特色发展格局

以系统思维整合京津冀红色资源,需从“资源普查—分类共享—差异协同—线路联动”多环节发力,构建全域统筹、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首先,开展三地红色文化资源全面普查,建立涵盖文物、文献、口述史的一体化数据库,京津冀三地文旅、文物部门与档案馆联合牵头建设,每年联合开展一次数据更新并同步征集新增资源,对科研机构开放基础数据查询权限,对经审核的文创企业开放合规素材使用权限,按“历史脉络—精神内涵—地域特色”三维分类:以“建党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时间轴厘清历史逻辑,提炼“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精神主题形成价值共鸣,标注三地各特色资源点并实现“一地录入、三地共享”,为资源整合奠定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协同”策略:北京依托国家级

场馆优势打造红色文化研究阐释中心,开展三地革命历史联动研究并编纂《京津冀红色文化通史》;天津发挥“近代工业遗产与红色文化”融合特色,建设北方红色文创设计基地,为河北提供技术支撑;河北聚焦“革命老区活化”,将西柏坡等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结合,发展“红色民宿”“非遗工坊”,形成保护与发展互促的良性循环。其次,三地联合打造“建党初心线”“抗战记忆线”“建国伟业线”三条精品线路,分别串联北京北大红楼、天津觉悟社、河北李大钊故居等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华北抗战整体、新中国成立进程三个维度实现资源互补。^[22]例如,2025年,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文物局携手推出第二批以“京津冀文化一脉”为主题的“抗战记忆”与“紫塞雄关”两条文物主题游径,进一步推动三地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和文旅的深度融合。其中,“抗战记忆”线路串联卢沟桥、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冉庄地道战遗址、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等点位,循着烽火岁月的足迹,带领游客回溯那段波澜壮阔的抗争历史,^[23]让分散的红色资源形成有机整体,既彰显各地特色,又强化区域红色文化的系统性与凝聚力。

(三) 以创新理念激活旅游产业,拓展文化传播维度

以创新理念激活京津冀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拓展文化传播维度,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联动资源开发、内容创作与渠道创新形成协同合力。一方面,应加速红色文化数字赋能,共建京津冀红色文化云平台,整合三地VR红色展馆、历史影像、红色故事音频等资源,开发“虚拟讲解员”“AI互动问答”功能,让用户在线“沉浸式”体验平津战役、西柏坡会议等历史场景。^[24]例如,京津冀三地文物部门在2025年推出“抗战记忆红色之旅——京津冀博物馆联合教育实践活动”,三地结合自身资源开启了多条红色线路,其中北京线路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核心,借助场景复原、VR等技术重现抗战家书,“让公众在‘一封信的旅程’中理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国情怀。”^[25]另一方面,要深挖三地红色文化精神共性与特色符号,联合创作《京津冀红色精神图谱》,系统阐释“西柏坡精神”“香山精神”“天津工人运动精神”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开发“红色剧本杀”“跨区域研学手册”等文创产品,结合河北“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等品牌建设,将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区域共同优势。例如,河北省近年来大力实施燕赵文旅品牌创建行动,面向京津精准定位消费群体,精心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长城文化旅游带”“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等,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新时尚。^[26]此外,还需创新传播渠道,在抖音等平台推出“红色记忆”系列短视频,邀请三地群众共讲跨区域红色故事等环节,吸引社会各界参与,让红色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元互动”。例如,2025年5月18日,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借助抖音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将革命文物转化为可触摸的精神图谱,^[27]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激活旅游产业活力,更有利于借助网络平台扩大红色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四) 以人才战略夯实发展根基,构建多元培育体系

京津冀城市群总体上看是人口流入区,但由于各城市人口集聚的趋势差异显著,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人口分布极化现象愈加严重。^[28]以人才战略夯实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发展根基,构建多元培育体系,需打破区域人才壁垒,形成“育、流、引、励”四位一体的推进路径。三地代表性高校牵头,联合开设红色文化研究跨校课程,整合历史研究、数字技术、文创设计等学科资源,定向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北京、天津优质人才资源向河北红色文化薄弱地区流动,补齐文物修复、数字化运营等能力短板。近年来,河北在这方面实行的举措亮点颇多,如2024年4月河北省红色旅游协会发布的《关于组建河北省红色智库的通知》指出,该智库“面向全省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军队、党政部门有关领导干部,红色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等多领域,吸纳政治素质过硬、具备党史史志研究特长、能够开展优质授课讲座的同志为红色智库首批成员”,智库成员主要“承担红色文化旅游相关政策研究、决策咨询、规划提升、课题调研、标准编制、教育培训、评估评审等工作”^[29]。针对红色文创、新媒体传播等急需领域,政府出台户籍、住房、科研经费等专项引才政策,辅以“京津冀红色文化创新奖”等激励举措,将跨区域合作成果与职称评审、项目申报挂钩,最终构建起“政府主导、高校支撑、社会参与”的多元培育格局,为三地红色文化协同发展注入持续智力动能。健全京津冀地区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的对接机制,推动高校科研力量向天津、河北的产业功能区拓展延伸;优化科技供需的匹配模式与成果转化路径,提高科技成果在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所占比重,从而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强区域内的人才共享,建立统一的科技人才评价与流动机制,推行企业与政府联合引进和留住人才的机制,具体流程为政府根据红色文物修复、文创研

发等急需领域制定人才需求清单,企业按清单定向引进,政府给予50%科研经费补贴,企业同步提供为期3年的住房补贴或人才公寓;人才服务期不少于3年,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者可优先纳入“公共编制池”^[30],构建多元培养体系。

五、结语与展望

京津冀红色文化因历史脉络相连、地理区位互补、精神内核同源,成为区域文化协同与红色基因传承的核心载体,其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激活红色资源时代价值的关键路径。尽管当前面临行政壁垒制约利益协调、资源整合低效致同质化、创新传播乏力难触新受众等现实困境,但通过顶层设计构建全域治理体系、以系统思维打造特色资源格局、借创新理念拓展文旅维度、靠人才战略夯实发展根基,可逐步破解瓶颈。未来,随着跨区域协同机制的深化与各方合力的凝聚,京津冀红色文化协同创新共同体将实现从“资源串联”到“价值共鸣”的跨越,既让红色精神在代际传递中焕发新生,也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为全国区域红色文化协同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从严治军[N]. 人民日报, 2014-12-16(01).
- [2] 孙丽娜, 王宝旺. 十余年来京津冀红色文化研究述评[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6(4): 56-64.
- [3] 武少民. 擦亮历史文化名片[N]. 人民日报, 2024-03-20(05).
- [4]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320-324.
- [5] 岳菊, 黄泰. 时空交互视角下京津冀区域历史文化空间跃迁特征及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25, 45(7): 1562-1574.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 [7] 罗红杰. 历史虚无主义软性叙事: 内生机制与应对策略[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9(2): 85-93.
- [8] 形式多样, 不断拓展纪念馆社会教育功能——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深入开展“红色文化进军营、进社区、进课堂”活动[J]. 理论导报, 2010(7): 68.
- [9] 九年携手并进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日渐紧密[EB/OL]. (2023-07-03) [2025-03-01]. <https://news.bjd.com.cn/2023/07/03/10483826.shtml>.
- [10] 李雅静, 陈彦光. 京津冀城镇体系的位序—规模与异速生长标度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6): 84-92.
- [11] 张可云, 蔡之兵.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J]. 河北学刊, 2014, 34(6): 101-105.
- [12] 河北: 打造有吸引力的红色旅游目的地[EB/OL]. (2022-05-12) [2025-07-10]. https://www.mct.gov.cn/whzx/qgwhxxlb/hb/202205/t20220512_932953.htm.
- [13] 曾喜云.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5.
- [14] 刘岳, 宋传信. 北京红色遗存现状、特点与保护利用[J]. 北京党史, 2019(3): 26-32.
- [15] 潘春苗, 母爱英, 翟文. 中国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空间特征——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对比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2): 50-58.
- [16] 百年党史展中的新方式、新技术、新体验[EB/OL]. 求是网. (2021-08-26) [2025-08-11]. https://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1-08/26/c_1127787644.htm.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1-32.
- [18] 胡恒松, 苗文惠. 新质生产力布局下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8(2): 40-48.
- [19]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2020·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138.
- [20]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深入推进北京红色文化建设凝心聚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J]. 前线, 2017(10): 74-76.
- [21] 董城, 贺亚兰, 陈红玉, 等. 京畿大地: 文化一脉绽芳华[N]. 光明日报, 2024-07-25(07).
- [22] 安博武, 陆朋. 京津冀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 20(16): 17-18.
- [23] 河北省红色旅游协会编. 《河北红色旅游简报》(2025年第11期)[EB/OL]. <https://www.hslyxh.com/index.php?m=&c=news&a=detail&id=2547>.
- [24] 刘洋, 兰旭, 吕少英. 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京津冀区域为例[J]. 文化产业, 2020(13): 74-75.
- [25] 李祺瑶. 京津冀三地博物馆开启红色之旅[N]. 北京日报, 2025-07-20(03).
- [26] 史晓多.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出“好路子”[N]. 河北日报, 2023-04-04(08).
- [27] 河北省红色旅游协会编. 《河北红色旅游简报》(2025年第8期)[EB/OL]. <https://www.hslyxh.com/index.php?m=&c=news&a=detail&id=2470>.
- [28] 王振坡, 姜智越, 郑丹, 等.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J]. 西北人口, 2016, 37(5): 31-39.
- [29] 河北省红色旅游协会编. 《河北红色旅游简报》(2024年第6期)[EB/OL]. <https://www.hslyxh.com/index.php?m=&c=news&a=detail&id=2080>.
- [30] 米彦泽. 京津冀高质量一体化提速[N]. 河北日报, 2025-07-29(06).

[责任编辑 金 钊]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Model for Red Cultur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UN Lina^{1,2}, GUO Fuhao¹, KONG Rui¹

(1.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Beijing—Tianjin—Hebei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magnificent century-long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s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three areas shar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d culture synergy. To be specific, the revolutionary stag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their locations complement each other; besides they all embody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s, mission,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Accordingly, to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model for red cultur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ross-region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hat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Party leadership,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livelihood. Curr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mode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interest gaming, inefficient and homogenized resource integration, weak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tc. To overcome these dilemmas, top-level design is needed to break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systematic thinking to integrate red resources, innovative concepts to revitalize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a talent strategy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red cul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for red culture